

终身成就奖

徐中玉：文须有益于天下

一套学校分配的老公寓，徐中玉一住就是几十年。4间大小居室里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，到处都是，甚至床上、走廊、墙角、衣柜里、窗台上都堆了一层又一层。近日，在徐中玉先生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之际，记者再次拜访了徐先生。

再过两个月，徐中玉就满100岁了。和老先生交谈，会明显感觉他时而思路清晰，时而神情迟滞。比如，问他一生的经历与荣誉，他似乎“忘”得差不多了，但聊起老人家一生从事的文艺理论研究和语文教学工作，他又似乎意犹未尽。时而清醒时而打盹，一次“奇怪”的对话由此而成。

文须有益于天下

问：您的家里堆了那么多的书，还订了好几份报纸和专业杂志。您那么大岁数了，还在看书写作啊？

答：你可以先看看我的家，我有很多书啊，一般我不让家里人随便动，只有我知道什么书在什么地方，我顺手就能找到。现在新书都没地方放，连吃饭的地方也没了。看书学习是我一辈子的工作，搞学问更是我的使命。这些年文学发展有不少进步，但还远远不够，还要与时俱进，做得更好，要有新作为、新创造。所以，我一直要求自己，包括要求我的学生，要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学的责任与使命，强调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。

问：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，是您常常对后辈学人的教诲。对这句话，您一定有很深的感悟吧？

答：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忍辱负重，对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充满了挚爱。我认为，正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这样的书生意气。“书生意气”往往被认为是贬义词，我却认为其中蕴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，“不以一身祸福，易其忧国之心”，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意气，它是一种升华了的知识者精神，体现了知识分子高尚的理想和追求。顾炎武说：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”，这是自觉承担责任的精神，不是为了功名富贵，也不是自以为能扭转乾坤，而是一种责任感和对国家民族深深的爱。价值观念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，但这种精神却不会过时。我认为，真正伟大的文学家身上绝不缺少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担当，屈原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、曹雪芹、鲁迅概莫能外。这正是顾炎武所谓的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。这种“志士仁人”的精神品质是从孔孟一路发展下来的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传统。有的作者够不上“志士仁人”的标准，虽然也写出过一些较好的作品，但终究不能得到大家最高的评价。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审美前提下强调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，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，应予珍重，不必打倒，也不打倒。

职业素养有要求

问：您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，也是文艺批评的大家。您觉得，开展文艺批评最需要和最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

答：批评家的困难就在他一定要养成一种独立评价的能力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他就无法避免不做应声虫，不做别人的尾巴。要做到表面上的独自评价也许还容易，要做到里外如一的独自评价就难了。你的主张可能不是随便从什么人的口里或什么书本上得来的，但这还不一定就是你独立的评价。

我认为，独立评价的能力不是故意立异，为了要不同凡响便不惜标新立异，以图



徐中玉：文须有益于天下

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

成就简介

徐中玉 1915年2月出生，江阴人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，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、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名誉会长等职。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，撰著、编著教学书籍约1000万字，主编教材和期刊达2000万字。

徐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追求真理、关注现实、融贯古今，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，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，在文学理论研究界享有崇高声誉。2009年，他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。

耸人听闻。文艺评论家自身要加强提高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。职业精神就是热爱评论事业，敢于自由思考，敢于讲真话，大胆发表对作品的直言不讳的评论。

文艺评论是一项兼具艺术眼光和科学精神的事业，对评论家有很高的职业素养要求。一是广泛深入的阅读，观赏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，是文艺评论家绕不开的最基本的功夫。修养不是句空话，而是漫长、艰苦的文化积淀。二是始终保持对新现象、新作品的职业敏锐感，善于发现其中体现的新艺术特点和新的审美要素。三是努力

形成具有个性风格的评论语体，用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思考，传达自己的思考，言必己出，力戒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。

教材选文需开拓

问：我发现，您家最多的书大概就是由您主编的《大学语文》了。我也知道这本教育部的部编教材已经在全国2000多所高校使用，至今已出版和修订到了第9个版本，见证着您的教学研究人生。作为一个大学问家，您为什么对一本本科生的教材那么倾注心血呢？您主编的语文教材，最大的

特点又在哪里呢？

答：《大学语文》教材的选文应有基准，但非一成不变。我认为选文应多样化，丰富多彩，各臻其妙。教材选文需要不断有所开拓，但必须是真正的精品，有深度，有魅力。一时流行，或被认为“当红”的文字，有其作用，但并不一定符合选在“大学语文”教材中的要求。文学性、思想性的高标准是不能降低的。目前，消费主义观念盛行，出于商业目的的炒作甚多，如有些教材选文缺乏慎重考虑，那就违背开设《大学语文》课程的初衷了。

我一直认为，大学语文课的教育重心，必须仍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进一步培养上。古代文化、文学精品是历史的产物，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先贤们思想、情感的结晶，历经时间考验，至今仍然显示出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历史证明它能焕发出浓郁的艺术魅力，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。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，文学是其中极其厚重的组成部分，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炎黄子孙，是前贤留给我们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的精神宝库。因此，《大学语文》教材应当特别重视吸收那些能够体现高尚理想、健全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，深刻反映历史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密切关注的问题，表现真挚的思想感情、智慧理性、审美价值的作品，使学生通过阅读、思考、讨论、辨析，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前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成果，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。这必定会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、精神境界、人生追求和价值标准产生巨大影响。大学语文课也应当以文化、文学精品为基础，从具体出发，从实际出发，离开了这两者，一味地抽象说理、泛泛空论，再加上“一言堂”式的灌输方法，就起不到启发、熏陶的作用。

读书会大有益处

问：去年，华东师大出版了《徐中玉文集》，凝聚了您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研究心得，其中有不少篇章是有关“读书”的。您一生对读书的最大体会是什么？

答：历来有“开卷有益”之说，读点书总比不读书或拒绝读书为好。当然，这是指读好书，而非读坏书。我的方法是“多读、熟看、手抄，还要深思”。书是宝物，读书大有益处，但只有真正从读书中感到了极大乐趣的人，才能充分发挥阅读的主动性，从而在专业上取得成就。

书籍浩如烟海，一个人究竟应该读哪些书，这要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。苏轼有志“救时”、“济世”，他读过许多书，兼收并蓄，从中取得了各种营养。苏轼不但要求“好读”、“熟看”史书，而且还再三提出“手抄”的必要，他觉得手抄一遍，与泛泛看过效果大不相同。书架上有书，不等于腹中有书。从架上书变成腹中书，再从死读书变成活读书，需要花很大的力气。

问：明年您就实足一百岁了，衷心祝福您健康长寿。您现在除了看书，还有其他的“业余生活”吗？

答：我每天6时多起床，一天里有看不完的书，还要看新民晚报，有时还要做些摘抄。各地同行和学生给我寄来的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，我也要抓紧时间去读。有时看累了就在床上躺上一两个小时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表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家人会陪着我到不远的长风公园晒太阳。从前我能走整整一圈呢，比年轻人走得还快，现在走不快了……

本报记者 王蔚